

民主與經濟發展： 結合質與量的研究方法*

郭 承 天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

吳 煥 偉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碩士班研究生)

摘 要

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發展是否有必然的相關？目前的學術研究，由於所使用的理論和方法論的差異，並沒有一致的結論。本文首先試圖從現有紛亂的計量研究方法中，歸納出一些比較合適的測試模型、相關的變數、以及資料庫的使用方法。但是計量分析法有其限制，仍須輔以「質的分析法」。因此，本文隨即評論現下學者使用「質的分析法」的優缺點，並建議如何結合計量分析法和質的分析法，以達到分析的最大效度。最後，本文從這些方法論的角度，檢討台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況，並指出將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民主、經濟發展、理論、方法論

* * *

壹、前 言：回到爭議的原點？

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發展是否有必然的相關？經濟發展是否會必然導致民主政體的建立？民主是否會促進或阻礙經濟發展？這些問題不只是自韋伯（Max Weber）以來，社會科學家所一直探討的重要議題。同時也是執政者擬訂國家經濟發展策略的主要政治考慮之一。二次大戰結束後，現代化理論的興起，認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是相輔相成，因此成為許多新興獨立國家追求的共同目標。然而這些國家隨後經濟發

-
- 本文原稿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政治學研究方法」學術討論會，台北，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作者們感謝謝復生、吳釗燮、盛杏澐、鄭敦仁教授的指正，「政治經濟學研究會」參與者的建議，陳尚懋和逢振康提供最佳的研究助理工作。本文的一部分，改寫自郭承天的研究計畫「東亞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國科會 NSC86-2414-H-004-017。

展的遲滯不前，促使社會科學家重新反省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許多學者以及威權政體的領導者，認為在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之間，必須做一「殘酷的選擇」，^①因為民主會阻礙經濟發展。這一觀點，在一九八〇年代以「發展國家論」集其大成，成為學術界中的顯學，至今而不衰。然而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至今的民主化浪潮，迫使社會科學家再一次的思考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到底現代化理論經過了四十多年的起起伏伏，到頭來還是對的？還是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正在或即將面臨另一次「殘酷的選擇」，重演一九六〇和一九七〇年代新興民主政權的崩潰？

粗覽這方面的最新研究著作後，任何研究者都會得到一個結論：沒有結論。這個「沒有結論」的結果，並不只是因為現有的各式理論，尚未統合；更因為研究方法的巨大差異，使得學者在應用同一個理論時，也會產生互相矛盾的發現。暫且不提爭議已久的「計量研究法」和「質的研究法」之間的優劣問題。就是被認為科學性很高的計量研究法，應用到這個研究議題時，並未顯現出它的「知識累積性」。例如，研究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時，如何界定民主化和經濟發展這兩個概念？兩者間的數學關係，以一次方程式、二次方程式、或者是自然變數方式表達比較好？是否應該控制其他的變數（如歷史的因素、地區的差別、政府體制的差異、國際的影響、政府干預市場的程度等）？應該做定點（特定一年份）跨國分析，還是作時間序列的分析？最嚴重的問題是，學者們至今尚未同意應該共同使用那一組資料庫。因此，即使兩位學者使用相同的理論和測試模型，由於使用的資料庫不同，可能就有相反的結論。

本文的第二節即試圖從現有紛亂的計量研究方法中，歸納出一些比較合適的測試模型、相關的變數、以及資料庫的使用方法。但是計量分析法有其限制，並不能充分說明民主化現象中動態、策略、和非量化的因素。因此，計量分析法仍須輔以「質的分析法」。第三節評論現下學者使用「質的分析法」的優缺點，並建議如何結合計量分析法和質的分析法，以達到分析的最大效度。第四節從這些方法論的角度，檢討台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況，並指出將來可能的研究方向。最後一節為結論。

貳、計量研究法

社會科學中的計量研究法絕對不是「資料帶動」（data-driven）的數字遊戲。它必須選擇或建構一些理論（theories），闡述主要變項（factors）之間的邏輯關係。根據這些理論和變項間的邏輯關係，建構出相對應的測試模型（models）。然後將主要變項運作化（operationalize），找出適當、可量化的變數（variables）。最後，找到適當的資料庫，測試理論和模型的正確性。

現有民主化和經濟發展的計量研究，都具有理論、模型、變數、和資料庫的部分。

註① Jagdish Bhagwati, *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Sammul P. Huntington and Joan M. Nelson,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但是也就是在這四部分，研究者有極大的差異，使得我們至今無法確定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之間，到底有何關係。以下三小節根據理論、模型、變數和資料庫，來比較現有的研究。最後一小節試著歸納出一些研究者的共識，以及計量研究法的限制。

一、理論的選擇

學者對於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看法，可歸納成四類（見表一）：(一)認為經濟發展可導至或有助於民主化，(二)民主化會促進經濟發展，(三)經濟發展並不一定會導至或有助於民主化，(四)民主化並不一定會促進經濟發展。這四種看法，各有不同的理論基礎，也引用不同的實例。贊成第一種看法的學者，也不一定贊同第二種看法。反之亦然。以下略述。

表一 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政治民主化	是 → 工業化國家、後威權新工業化國家
	否 → 美國早期、普魯士、印度、威權新工業化國家
政治民主化→經濟發展	是 → 工業化國家
	否 → 前社會主義國家、印度、拉美國家（1950s~1960s）

(一)經濟發展導致或有助於民主化

經濟發展導致民主化的論證，在早期幾位著名社會科學家的著作中，就曾述及一二。例如 Max Weber 認為新教倫理強調個人主義有助於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的發展，Karl Marx 主張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Joseph A. Schumpeter 認定資本主義能促成民主政治的發展。^②但是此一論點的發揮，則以 S. M. Lipset 為代表的現代化學者（modernization theorists）最先做有系統的陳述。^③其後也有眾多的學者，以計量研究，支持這種理論。^④他們認為經濟發展首先會導至社會經濟功能的分化和

註② Schumpeter 的作品常被自由派學者引用，但是事實上他所提出唯一的證據，只是資本主義導致印刷新聞業的出現。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42), p. 147.

註③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1959), pp. 69~105.

註④ 例如 Kenneth Bollen and Robert W. Jackman,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0 (1985), pp. 438~457; P. Coutler,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75); P. Cutright and J. A. Wiley, "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1927~1966,"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5 (Summer 1969), pp. 23~44; Larry Diamo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35, No. 4/5 (March/June 1992), pp. 450~499; K. W. 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0 (September 1961), pp. 493~509; Mancur Olsen,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3 (October 1968), pp. 699~712.

專業化，國家機關和領導階層不再能夠全盤控制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而必須以協商代替命令。為了保障財產權和促進各行各業的利益，獨立自主的社團開始出現，經由社會和政治的動員，主動要求參與決策制訂和執行的過程。經濟發展也同時促成教育普及和中產階級的興起，進而帶動政治意識的覺醒。這些中產階級在滿足物質方面平均分配的同時，也開始要求政治權力的重分配。也就是說，經濟發展促成獨立自主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擴張，民主政治因而產生。

現代化學者以歐美工業先進國家和後威權新工業化國家為例，支持他們的理論。工業革命在十八世紀時，由英國傳播到歐美其他國家，引起經濟和社會的大變動。經濟社會分化和專業化的結果，使得中產階級代替了傳統地主貴族階級，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軸。而美國革命(1776)、法國革命(1789)、以及隨後民主政治在歐洲的擴散，都是反映經濟發展的政治效果。相對的，開發中國家之所以未能普遍採用民主政治，就是因為他們的經濟還沒有發展，社會還未分化、專業化，而且缺乏一個廣大、有影響力的中產階級。近十年來，「發展國家理論」(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ists)或新威權主義者(neo-authoritarianists)也以新瓶裝舊酒的方法，主張在經濟發展之後，民主政治才會產生。他們以南韓、台灣為例，認為這兩個國家近十年的民主化，要歸功於一九六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所創造的經濟奇蹟。

如接下來會討論的，由於受到其他理論的批評和反例的出現，上述的理論已減少其「決定論」的色彩，而代之以「環境論」。新的說法是，經濟發展並不必然導致政治民主化，但是它能為政治民主化創造一個有利的成長環境，使得民主化過程較為平和順利。^⑤除了前述的一些因素以外，經濟發展可以產生許多獲利的機會，用來補償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的失勢者。不論是失勢的貴族、威權統治官僚、干政的軍人，或是爭權失敗的政客，都可以在繁榮的經濟體內，找到適當的工作機會，或得到優厚的物質報酬。一個發展繁榮的經濟，也因此構成了民主化權利重分配的一個良性氣栓，疏通政治體系調整時的壓力。^⑥

現代化理論中，另外有些學者強調「政治文化」的因素。他們並不認為經濟因素是導致「公民社會」成長的唯一因素，並因而決定一個國家是否會採取民主政體。他

註⑤ Harold Crouch, "Military-Civilian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New' Democrac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aipei, Taiwan, August 27~30, 1995, pp. 27~29; Francis Fukuyama, "Capitalism & Democracy: The Missing Link,"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Revisited*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01~102; Juan J. Lin and Alfred Stepan, "Towards Consolidated Democrac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aipei, Taiwan, August 27~30, 1995, p. 3; Philippe C. Schmitter, "On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aipei, Taiwan, August 27~30, 1995, p. 2.

註⑥ Abbas Pourgerami,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n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CO: Westview, 1991), p. 9.

們認為威權性的文化體系，如天主教、東正教、回教、和儒家思想，講究對權威、執政者、集體的服從，不適合現代民主政治中，強調個人自由、平等、和民主參政的價值觀，更不太容忍自主性的「公民社會」挑戰國家機關的權威。只有在新教的國家（北歐、英、美），或是受新教殖民帝國統治過的第三世界國家（如印度、菲律賓），才容易建立起民主的人格，和自主的社會團體。

（二）民主化會促進經濟發展

民主化促進經濟發展的途徑有幾種：1. 民主化的結果，導致社會福利（如教育、健康、衛生）供給的增加，使得社會的總生產力因而提昇。2. 民主化可減少經濟壟斷、財富的集中，使得經濟資源做更有效的分配。3. 民主化使得財產權受到保障，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4. 民主化可改進公共政策的品質。政策制訂時有更多的資訊，執行時可減少貪污腐化。且因合法性的增強，政策的效果也較好。^⑦主張此說的學者也以工業化國家為例證。歐美民主國家從工業革命以來，一直是科學技術、經濟理論、和管理知識的發源地。這些都與民主制度的普及教育、財產權的保障、反壟斷、和民主決策相關。

以上學說主張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是相關的，不論何為因、何為果、或互為因果，都認為政治體系與經濟體系，可經由某種機制或過程而關聯在一起。但是有些政治經濟學者並不認為政治體系與經濟體系，是全然相關的。一方面因為這兩個體系都是總體體系，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很難論斷。另一方面，雖然資本市場和民主市場有很多類似的特性，但是資本市場基本上有其「階層和指導性」，而政治市場則以平等和自主性為特徵。^⑧以下兩說，即以此為出發點。

（三）經濟發展並不一定會導致或有助於民主化

認為經濟發展並不一定會導致或有助於民主化的學者，即主張民主化的議題有其獨立性（autonomy）。民主化所牽涉的分配，基本上是政治權力的重分配，它也許會、也許不會涉及經濟權力的重分配。民主化參與者的動機，可能不是經濟的因素，例如基於意識形態的差異、受到專制統治的政治迫害、對外戰爭失敗後所引發的民族主義、或領導階層的權力內鬥。參與者所動用的資源，也不一定是經濟的，例如以勞工、農民、流氓地痞、或訴諸廣大群眾，來推翻現有政權。因此民主化的開端和進行，不一定與經濟發展有關。從集體行動理論（collective action theory）來說，民主化更重要的因素，在於是否有政治企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的出現，他們是否有能力組織足夠的反對力量，結合有力的政治聯盟，並以憲政的方式維持主要政治勢

註⑦ Jagdish Bhagwati, "The New Thinking o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6, No. 4 (October 1995), p. 54.

註⑧ Frank Bealey,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3 (February 1993), pp. 203~223; David Beetham, "Four Theorems about the Market and Democrac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3 (February 1993), pp. 192~195.

力之間的均衡。◎因此經濟發展並不一定會導致或有助於民主化，而經濟的衰退，也不必然導致民主的崩潰。

例如美國的民主革命和早期的民主鞏固過程，並沒有受到經濟發展太大的影響。一直要到十九世紀中期，工業化才影響到民主化的進一步發展(美國內戰和黑奴解放)。印度的經濟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以前，一直是遲滯緩進，但是它的民主政治卻順利的成長。菲律賓在一九八六年的民主革命，也是在該國經濟最衰退時發生的。而前社會主義國家雖然經歷了連續四年的經濟蕭條，人民對民主政治的支持仍然堅定。◎

經濟發展對政治民主化影響的不確定性，可由它的負面效果來看。經濟發展可能是由權威型國家帶動，以國家資本主義方式進行。在這一種政治經濟體制下，主要的生產者可能是國營企業，可能是經由國家許可的外資企業，或者可能是依賴國家機關補助、保護的民間企業。由於這些資本家與所謂的資本國家 (capitalist state) 有共生的關係，他們不但不能成為民主化的助力，反而容易成為阻力，防阻任何足以威脅他們既得利益的新政治勢力出現。這一類型的例子，包括十九世紀末期普魯士帝國的工業化：一個高度軍隊化的政權，結合了傳統貴族階級，以及新興的金融、工業集團，迅速的發展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在半世紀內趕上英、法等先進國的工業水準，而國內的政權結構，只有愈趨保守集權。◎從台灣和南韓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新加坡從建國至今、以及香港的政經發展例子可知，雖然經濟在急速的發展，但是民主化的腳步卻非常緩慢。另外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快速成長，不但沒有促成政治民主化，反而增加了共產黨統治少見的合法性。Francis Fukuyama 甚至認為亞洲國家為了維持「後工業化」的經濟現代化，可能會犧牲西方民主的價值，而再轉向傳統的東方威權價值體系。◎

新馬克斯學者 (neo-Marxists) 認為國際資本擴張的結果，使得國際資本家、第三世界國家、和本地資本家，合作形成一「三角聯盟」 (triple-alliance)。為了汲取三角聯盟成員最大利益，開發中國家的領導者，比較傾向於採取威權政體，壓制勞工運動，以防止勞工利用選票的優勢，爭取薪資上漲和勞工福利的提高。◎

註◎ Tun-jen Cheng, "Taiwan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James W. Morley. ed., *Driven by Growth: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 pp. 194~195.

註◎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op. cit.*, p. 25.

註◎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chapter 1; Kyung-won Kim, "Marx, Schumpeter, and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Revisited*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8.

註◎ F. Fukuyama, *op. cit.*, p. 104.

註◎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K. A. S. Wickrama and Charles L. Mulford, "Political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articulation, and Social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37, No. 3 (1996), pp. 375~390.

以 O'Donnell、Linz、Stepan、和 Przeworski 等人為主的「策略互動學派」，也認為經濟發展、歷史、文化等結構性因素，並不能充分解釋南歐和拉丁美洲民主化或民主政體崩潰的過程。真正重要的因素，在於參與政治競爭的各種「策略團體」（strategic pacts），是否能夠達成「制度性的協商」（institutional compromise），來保障彼此的重大利益。因此，此派學者重視的是對於各國策略團體的集體利益、動員能力、策略應用、以及互動過程的分析。同時，政府體制的選擇，也將影響到策略團體互動的政治規則及後果，所以這派學者也探討總統制或內閣制對民主政體穩定的影響。^④最後，區域內其他國家所採行的政治體制，對於本國策略團體的互動，也有「示範效果」。歷史上三波的民主化及之間的民主政體崩潰，都各自集中在某一時段和某一些地區，顯示出鄰國民主化的成敗，似乎會影響策略團體對彼此政治實力的重估，因而導致傾向民主或採取威權體制。

（四）民主化並不一定會促進經濟發展

民主化不必然導致經濟發展的原因，是由於以政治方法（一人一票）來重新分配經濟資源，不一定會符合經濟效益的法則。在平時沒有競爭力的行業，會要求國家機關給予保護或補助。大資本家會挾著經濟的優勢，脅迫國家機關給予壟斷權力。國會的政客為了贏得選民的支持，常常通過分贖法案（pork barrel bills），浪費國家資源。在經濟蕭條期，來自廣大貧窮階級的壓力，使得民主政府迫於選舉的政治考慮，會傾向採用以消費為主的財政、金融政策，而這些政策所造成的財政赤字、通貨膨脹、貿易失衡等長期經濟發展問題，則不是面對短期選舉壓力的政客所關切的。^⑤

拉丁美洲國家在戰後的二十年和現在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它們的民主化並未帶來高速的經濟發展，反而是經濟的蕭條和萎縮。有些研究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提出了「轉型矛盾」論（transitional incompatibility thesis），認為民主化阻礙了經濟改革，而強勢的經濟改革將使民衆反對民主政體。^⑥另外，號稱開發中國家民主政治表率的印度，它的人均所得現在也比不上由極權政體發動經濟改革的中國。事實上，如Dahl所說，由於完全競爭市場可能導致買票、侵害個人自由和人權、社會不

註④ Juan J. Linz,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註⑤ F. Fukuyama, *op. cit.*, p. 99;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52, 248; Adam Przeworski, Michael Alvarez, Jose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of Durability of Democracy, 1950~199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August 27~30, Taipei, Taiwan, 1995, p. 4.

註⑥ Leslie Elliott Armijo, Thomas J. Biersteker, and F. Lowenthal Abraham, "The Problems of Simultaneous Transi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5, No. 4 (October 1994), pp. 161~165.

公平、經濟競爭的社會成本等違反民主基本原則的事情，因此「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是採用部分國家干預的混和式經濟」。^①

以上對民主化和經濟發展關係的四種看法，由於受到近年來研究精細化的影響，已經有部分融合的趨勢。這種趨勢主要是區分民主政體的建立和鞏固階段。例如，Przeworski and Limongi 最近認為 Lipset 的現代化理論，應該分為兩部分：一是經濟發展導致民主政體的建立，另一是經濟發展導致民主政體的鞏固。他們根據第三種的看法，拒絕了 Lipset 第一部分的論點；但是認為民主政體建立以後的鞏固過程，會受到經濟發展良莠的影響，因此 Lipset 的第二部分論點是正確的。^②

另外 Muller 主張民主政體建立時，如果當時所得分配極不均衡，廣大窮苦群眾會要求民主政府採取重分配政策。既得利益階級藉著雄厚的政商資源，仍然可以主導政治決策和執行的過程，使得重分配政策無法順利實施。人民因此對民主政體失去信心，轉而訴諸示威、遊行、罷工、或是暴動。既得利益階級促使國家機關鎮壓反抗運動。結果不是產生威權體制的政府，就是共產政權。^③因此，Muller 認為民主化不適宜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初期提倡。^④這一研究趨勢，實際上結合了現代化理論和策略互動理論，並且支持了發展國家論關於「先發展、後民主化」的論點。

二、模型的建構

從上節四大類理論和最近的融合論，我們可以歸納出學者使用的三類測試模型。第一型測試經濟發展導致民主發展的因果關係，第二型測試民主發展促成經濟發展的因果關係，第三型為混和型。各型本身都有一些變異。討論如下：

(一)模型 A：經濟發展導致民主發展

$$\text{DEM} = \alpha + [\beta_i] * [\text{EC}_i] + [\beta_j] * [\text{SE}_j] + [\beta_k] * [\text{CUL}_k] + [\beta_m] * [\text{POL}_m] + [\beta_n] * [\text{OTH}_n] + \epsilon$$

在這一類測試模型中，DEM 代表一個民主化的變項，是被解釋項。程式的右邊為解釋項，[EC_i] 代表一組經濟發展的變項。[SE_j] 代表一組社會經濟的變項，[CUL_k] 是一組文化變項，[POL_m] 則是一組政治和制度變項，[OTH_n] 為其他的變項。[β_i]、[β_j]、[β_k]、[β_m]、和 [β_n]，是以上各解釋項變項的相關係數

註① Robert A. Dahl, "Why Free Markets Are Not Enough,"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Revisited*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77~79.

註②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2 (January 1997), pp. 155~183.

註③ Edward N. Muller,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 (December 1995), p. 968.

註④ *Ibid.*

組。 α 和 β 分別是統計程式中的截距和誤差數。各變項的實際指標（變數），下一節中再討論。這裡只討論此一模型的建構和變異。

最簡單、最原始的模型，就是單一變項分析（univariate analysis） $DEM = \alpha + \beta * EC + \epsilon$ 。研究者找到一個經濟發展的變數，如人均所得，來預測一個國家民主化的程度。這種模型已是眾所皆知的不可靠，因為它並沒有控制其他的變項，使得 β （值的大小、正負、和顯著程度，都是問題。有些研究者發現，單一變項分析時，人均所得的增加，反而會導致一個國家民主化程度的下降。但是在加入其他變項之後，就發現人均所得與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就是顯著的正相關。^②因此，最近的主要計量分析，都採取多變項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在採取多變項分析時，大部分學者也注意到根據不同的理論，找出兩個以上的變項，以求在模型簡單化的原則下，達到最大的解釋力和測試不同理論的能力。^③也就是說，如果依據模型 A 的理論分類方式，則每一類的變項中，至少應該有一個變數，而最多似乎以不超過五個變數較為適當。目前的研究常碰到的問題是，學者往往沒有兼顧所有主要的理論變項，使得不同的計量模型所計算出的相關係數，其值的大小、正負、和顯著程度，也都有不同。

除了理論變項的多寡以外，變項與被解釋項之間的關係，以及變項彼此之間的關係，應該以何種數學形式表現，也是一個爭議。以代表經濟發展的「人均所得」變數為例，現在大多數學者會將人均所得，先採取其「自然係數」（natural log），再計算其相關係數。理論上的理由是，經濟發展在初期和中期，對於民主化可能有比較大的影響；而超過某一所得水準時（例如早期工業化的國家），經濟發展對於民主化，就沒有太大的影響。也就是說，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可能有一些「門檻」（threshold）的問題。^④但是有些經濟學家（如 Kuznet）認為，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數學關係，可能呈現「U」字型。^⑤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初期，可能造成所得分配的惡化，一直要發展到中期以後，所得分配才會趨向平均。而有些政治學者認為，所得分配不均的惡化，可能導致威權政體的興起。因此，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應該是「負→正」的二次函數關係，而非自然係數的關係。Lipset 等人更發現，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可能不只是二次函數關係，而是「N」字型的「正→負→正」的

註② A. Przeworski and F. Limongi, 1997, *op. cit.*, p. 166. 雖然該文使用「實際購買能力」變數，而發現某種對民主化特殊的影響力，但仍使人懷疑其相關係數的真確性。

註③ 關於一九九一年以前十個主要的計量研究，參考 Diamond (1992) 的摘要表。Larry Diamo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pp. 469-471.

註④ 支持「門檻」的說法，有 Deane E. Newbauer, "Some Social Conditions of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1 (December 1967), pp. 1002-1009; Robert W. Jackman, "On 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Democratic Perform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7 (August 1973), pp. 611-621.

註⑤ 不過，Deininger and Squire 使用世界銀行的新資料後，並沒有發現有 Kuznets「U」型曲線存在。Klaus Deininger and Lyn Squire, "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A New Data-Base," *World Bank Manuscript*, 1996.

三次函數關係。⊗

就變項之間的關係來說，大多數謹慎的學者會先計算解釋項之間的相關係數，以找出可能引起 colinearity 的變數，並以其他統計方法解決之（如使用「工具變數」）。這種模型的假設，是解釋項之間沒有互動的關係。然而，現實社會中，解釋項之間可能會有互動關係，所以在模型中應該加入「互動項」（interaction terms），才能測知原來兩個變數真正的「主效果」（main effect）係數。例如，政府體制（總統或內閣制）與地區（拉美地區或亞非地區），在理論上可能有互動關係。但是目前尚無學者在其測試模型中，加入這類的互動項。目前只有 Gasiorowski 在其計量模型中，加入了「年代」和「通貨膨脹率」的互動項，以測試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對於早年的民主化和最近的民主化，是否有不同的影響？結果發現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只有對於早年的民主化有影響，而非近年的民主化。⊗

最後，時間序列的計量模型，也漸為學者所喜愛的模型。其理論基礎是，政治體制本身具有延續性（或惰性）。為了在模型中去除這種「延續性」對其他主要變數的影響，同時假設被解釋項的變化，是受到前一時段其他主要變項的影響，因此在模型建構時，只要資料庫容許，常以時間序列的方式呈現。如下例子中，加入 $[\beta_x] * [DEM_{x(t-1)}]$ 項，即在控制「延續性」的效果。⊗須注意的是，時間序列的統計分析要求每一年的變數都有變異值，否則當年的資料不列入計算。⊗

模型 A1

$$DEM_{(t)} = \alpha + [\beta_x] * [DEM_{x(t-1)}] + [\beta_i] * [EC_{i(t-1)}] + [\beta_j] * [SE_{j(t-1)}] + [\beta_k] * [CUL_{k(t-1)}] + [\beta_m] * [POL_{m(t-1)}] + [\beta_n] * [OTH_{n(t-1)}] + \epsilon$$

註⊗ Seymour Martin Lipset, Kyoung-Ryung Seong, and John Charles Torr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45 (May 1993), pp. 155~175.

註⊗ Gasiorowski 和 Diamond 認為第三波的民主化主要特性之一，就是它的政治脆弱性和不穩定性。Mark J. Gasiorowski,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Regime Change: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4 (December 1995), pp. 882~897; Larry Diamond,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in Robert O. Slater, Barry M. Schutz, and Steven R. Dorr, eds., *Glob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3), p. 42.

註⊗ Arat、Benavot、和 Feng 即採用此類模型。模型 A1 也可測試 Przeworski 等人（1997）的新論證，亦即經濟發展對於民主化之助益，是在民主政體建立之後，而非之前，只要把 $[DEM_{x(t-1)}]$ 改為民主或非民主的 dummy variable，分兩次測試即可。Zehra F. Arat,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Theory Revisited,"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1, No. 4 (October 1988), pp. 28~30; Aaron Benavot,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Cross-National and Longitudinal Finding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40, No. 4 (1996), pp. 377~403; Yi Feng, "Does Political Freedom Cause Economic Freedom or the Other Way Arou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PSA, San Francisco, CA, August 29~September 1, 1996.

註⊗ J. A. Stimson, "Regression in Space and Time: A Statistical Essa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9 (November 1985), pp. 914~917.

(二)模型 B：民主化導致經濟發展

$$ED = \alpha + [\beta_1] * [DEM_i] + [\beta_2] * [EC_j] + [\beta_k] * [SE_k] + [\beta_m] * [OTH_m] + \epsilon$$

模型 B 中的 ED 代表經濟發展，[EC_j] 這裡代表一組其他的經濟變項。其他變項的代表符號，如模型 A 的解釋。模型 B 中省略了兩個變項：文化和政治的因素。因為雖然許多使用「質的研究法」學者，認為新教倫理和儒家文化，有助於經濟發展；但是目前並沒有任何統計的資料，可證實這個說法。其實，就模型建構來說，「文化」是不太容易變動的變項，要來解釋變化多端的經濟發展，統計上很不容易成立，有 heteroscedasticity 的問題。政治變項則可包括在 [DEM_i] 變項中，^②或者因為缺少這方面的理論，尚無加入此模型的必要。

經濟學家對於建構經濟發展的計量模型，爭議已久，但大多是在爭議應該加入何種經濟變數，或者是以何種數學程式表達。^③對於「非經濟變項」則少討論。政治經濟學家最近開始帶入政治變項，來解釋經濟發展或相關經濟現象，但是也沒有再擴大到其他種類的變項。^④因此，這方面的研究空間仍然很大。至於變項與被解釋項之間和變項之間的數學程式關係，模型 B 與模型 A 所涉及的問題，大致相同，不再贅述。

(三)模型 C：混和式

$$\begin{aligned} DEM &= \alpha_1 + \beta_1 * ED + [\beta_j] * [SE_j] + \epsilon_1 \\ ED &= \alpha_2 + [\beta_k] * [EC_k] + [\beta_m] * [SE_j] + \epsilon_2 \end{aligned}$$

模型 A 和模型 B 都假設解釋項之間沒有因果關係。但是實際上，這些變項之間，可能會有一些複雜的因果關係。例如，經濟發展和教育程度可能會影響民主化（如模型 A），但是教育程度和其他因素也可能會影響經濟發展（如模型 B）。因此，如模型 C 的一個簡單的「系統程式」（system equations）可以表示這種關係。使用適當的統計技術，就可以算出各相關係數的比較正確數字和顯著程度。^⑤由於使用「系

註^② 例如，Olson 的利益團體論可產生利益團體數目和成立時間的變數。Mancur Olsen, *op. cit.* .

註^③ 例如，Bhagwati 發現過去的經濟成長模型，是根據 Harrod-Domar model，強調投資的重要，而假設生產力是固定的。事實發展並非如此，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政府，大量擴展政府部門的投資或儲蓄，反而扼殺了較有效率民間部門的投資與儲蓄。J. Bhagwati, 1995, *op. cit.*, p. 53.

註^④ Mansfield 依據 Olson 的論點，建構出一個包括政治和經濟變項的模型，發現民主化會阻礙貿易自由化。Pastor and Sung 用來解釋民間投資的模型，除了有經濟變項以外，還包括政治風險的變數。Edward D. Mansfield, "Democratization and Commercial Liberaliz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PSA, San Francisco, CA, August 29~September 1, 1996; Manuel Pastor, Jr., and Jae Ho Sung, "Private Investment and Democrac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9, No. 1 (March 1995), pp. 223~243.

註^⑤ Helliwell 使用不同的數學程式，表達這些變項之間的關係，然後分別測試這些模型。John F. Helliwell, "Empirical Linkages Between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4 (1994), pp. 225~248.

統程式」時，統計學方面的要求比較多，因此在這方面的著作很稀少，^③但是我們不能否定這種計量模型的研究潛能。

三、選擇變數和資料庫

除了模型建構的差異外，學者在模型中對於相同的變項，所使用的變數和資料庫也不盡相同，使得這方面研究知識的「累積性」成爲一大問題。以下根據模型 B 中所列的變項來討論。

就「民主化」一詞而言，大部分的學者都引用 Dahl 對於「民主政體」的定義，而找出相關的變數。該定義列出七項具體指標：政府首長爲民選，選舉定期而公平，公民投票權，公民被選舉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④但是學者對於如何將這些指標轉換爲變數，以及如何計算不同國家民主的程度，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產生了數種民主化資料的版本，根據資料產生的先後次序，目前計有：Bollen，^⑤ Gastil 和 Freedom House 自一九七二年以來所蒐集的民主化資料，^⑥ Gurr 的 Polity II 和 III 資料庫，Arat 的民主指標是由政治參與、競爭性、和公民權構成，^⑦ Vanhanen 強調民主參與的重要，^⑧ Pourgerami 的民主化量表結合「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資料、World Factbook、和 Gastil 公民權的資料，^⑨ Przeworski and Limongi 使用四個標準將所有國家分爲民主或是獨裁兩類，^⑩ Coppedge and Reinicke 的「多元民主」指標包括公平選舉、集會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和媒體多元性。^⑪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近來學者發現民主政體的建立和鞏固階段，可能涉及不同的因素和動態，因此有些學者針對政體的變動，蒐集資料。這一類的資料庫有

註^③ 如 John R. Oneal and J. Lew Silver, "Do All Good Things Go Together? The Effects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PSA, San Francisco, CA, August 29~September 1, 1996.

註^④ Robert A. Dahl,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Autonomy vs. Control*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0~11.

註^⑤ Kenneth A. Bollen, "Issues in the comparative 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5 (1980), pp. 370~390; "Political Democracy: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Trap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25 (1990), pp. 7~24.

註^⑥ Freedom House 的資料是先給予各國政治權和公民權評分。評分以後，將各類權利各分爲七等，然後再以兩權利的平均數，將國家分爲自由、半自由、和不自由三類國家。見 *Freedom in the World* 各年刊。

註^⑦ Zehra F. Arat,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Theory Revisited,"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1 (1988), pp. 21~36.

註^⑧ Tatu Vanhane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147 States, 1980~88* (New York: Crane Russak, 1990), p. 17.

註^⑨ Abbas Pourgerami, *op. cit.*.

註^⑩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op. cit.*, pp. 178~179.

註^⑪ Michael Coppedge and Wolfgang Reinicke, "Measuring Polyarch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25 (1990), pp. 51~72.

Gasiorowski 的 “Political Regime Change Dataset” 將九十七個最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分為民主、半民主、威權、和轉型政體。^④

使用不同的民主指標，會產生不同的統計結果嗎？以上的研究大多會報告其資料庫與其他資料庫的相關係數，而且一般來說相關係數都很高，顯示研究者之間雖然使用不同的民主指標，但是對於政體的分類，有類似的看法，因此統計的結果，應該也很相似。然而，事實不然。由於使用不同的資料庫，同樣的變數在不同的研究中，其值的大小和顯著程度，就會有差異。Benavot 建構一個測試模型之後，測試在 Bollen (1965~80)、Arat (1948~77)、Gastil (1973~88)、和 Vanhanen (1980~88) 四組資料庫上，發現沒有一個變數，不論是經濟、政治、文化、或教育的變數，能夠對四組資料庫的民主指標，有一致、顯著的統計相關。^⑤這個發現，使人懷疑(一)民主化在不同的時期，可能牽涉不同的變項，或者(二)以往的計量模型和結果，在沒有測試過其他組的資料庫以前，其真確度有多高？尤有甚者，Bollen 檢驗這些資料庫的結果，發現幾乎所有的資料庫都有「系統性的偏差」，肇因於資料收集者的意識形態、價值判斷、定義偏差、資料來源的限制、地區差異、和政府新聞檢查等因素。^⑥

在解釋項部分，問題比較少。最常用、也最有解釋力的經濟發展變數是折合成美元的 GNP per capita 和它的修正變數，例如 GDP per capita 或轉換成「實值購買力」(purchasing-power-parity) 的人均所得，^⑦且要校正其通貨膨脹率，以求真實的人均所得。有學者以「人均能源消耗量」代替這些變數，也有很好的統計效果。其他常用的經濟發展變數有測試「經濟危機論」的通貨膨脹率和經濟成長率，以及測試世界體系理論的貿易依賴度、商品集中度、外資比例、外債、平均關稅等。

社會經濟變數則包括教育水準(識字率，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人口比)、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非農業人口、都市化程度、媒體數量。其中教育水準一直被認為對民主化有顯著的效果，但是近年的發現，對這種論證有一些保留。^⑧近年來對民主化比較重要的變數，是所得分配的變數，現在多以 Gini 係數表現。^⑨最新的所得分配

註④ Mark J. Gasiorowski, “An Overview of the Political Regime Change Datase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9, No. 4 (August 1996), pp. 469~483.

註⑤ Aaron Benavot, 1996, *op. cit.*, p. 401.

註⑥ Kenneth A. Bollen, “Liberal Democracy: Validity and Method Factors in Cross-National Measur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7, No. 4 (November 1993), pp. 1207~1230.

註⑦ 見 UNDP 的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各期。

註⑧ 例如 Coppedge 發現大學生的多寡，才能影響民主化。Michael Coppedge, “Modernization and Thresholds of Democracy: Evidence for a Common Path and Proc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PSA, San Francisco, CA, August 29~September 1, 1996.

註⑨ 如 Muller 研究證實了所得分配對民主化的重要。Przeworski, Alvarez, Cheibub, and Limongi 發現民主政體在所得分配較均勻的國家，比較容易存活。E. N. Muller, 1995, *op. cit.*; Adam Przeworski, Michael Alvarez, Jose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What Makes Democracies End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1 (January 1996), p. 43.

資料，是由世界銀行所建立，尚未被學者廣泛使用。^④

常用的文化變數有宗教(新教、天主教、回教)，殖民經驗(英美或其他歐陸國)，種族同質性，以及地緣。有些研究發現新教國家似乎比其他宗教國家，更適合民主政體的建立和發展，而英美殖民過的國家，也比較容易建立民主政體。^⑤但是有些研究不同意這種發現。^⑥由地緣所產生的變數，一般都有很好的預測能力，顯示出世界的民主化演進，是一波波的進行，而且鄰邦的民主化或民主體制的崩潰，會有「示範效果」。^⑦

最常引起爭議的政治變數，是總統制或內閣制。以往的學者發現內閣制對於民主鞏固，比較有助益。但是近年來的統計研究，在更正地緣的偏差後，並未發現總統制或內閣制，對於民主化有特殊的影響。^⑧其他的政治變數有重要政黨數目、政府部門的公共開支、公共儲蓄、國營企業的大小、政府領導者是否為軍人、軍費的多少、和國內抗爭事件。^⑨

四、計量研究的趨勢和限制

以上的計量研究，到底對於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有何結論？如果暫時不論其限制，計量研究的結論，可以歸納如下六點：

- (一)早期的研究，發現經濟發展與民主化有單純、直接的正相關，似乎是不正確的。^⑩
- (二)經濟發展似乎對於民主政體的建立，沒有確定的影響；但對於民主化的程度和民主政體的鞏固，有顯著的影響。^⑪

註④ Quinn and Woolley 和 Przeworski and Limongi 都提及此資料庫。Dennis P. Quinn and John T. Woolley, "Inequality, Growth, and Democracy: Convergence across Fields and Regim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PSA, San Francisco, CA, August 29~September 1, 1996; A. Przeworski and F. Limongi, *op. cit.*.

註⑤ A. Benavot, *op. cit.*.

註⑥ E. Muller, *op. cit.*.

註⑦ A. Benavot, *op. cit.*.

註⑧ Shin 提出過去誤解總統制的原因，是因為現有穩定的民主國家很少採取總統制。如果只是比較開發中國家，總統制比內閣制表現得好多了。拉丁美洲的民主崩潰，多發生在總統制國家；而在亞洲、非洲、和南歐，則是內閣制國家容易有民主崩潰。Gasiorowski and Power 也有同樣的發現。Dob Chull Shin, "O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A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of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 47 (January 1994), p. 159; Mark J. Gasiorowski and Timothy J. Power,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the Third world: A Structural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PSA, San Francisco, CA, August 29~September 1, 1996.

註⑨ John B. Londregan and Keith T. Poole, "Does High Income Promote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 49 (October 1996), pp. 1~30; M. J. Gasiorowski, 1996, *op. cit.*.

註⑩ 發現正相關的研究有 Pourgerami, *op. cit.*, p. 42; 否定此種單純相關的有 Gonick and Rosh 以及 Arato A. Pourgerami, 1991, *op. cit.*, p. 42; Lev S. Gonick and Robert M. Rosh,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f the World-Economy on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1, No. 2 (July 1988), p. 189; Zehra F. Arat, *op. cit.*, pp. 28~30.

註⑪ John B. Londregan and Keith T. Poole, *op. cit.*, p. 2.

(三)民主政體對於經濟發展似乎沒有直接，但有間接的影響。其間接的影響，可能來自民主制度對於教育程度和民間投資，有正面的相關。^⑤

(四)財富（所得）分配似乎對於民主鞏固有顯著的影響。^⑥

(五)鄰邦民主的建立或崩潰所產生的「示範效果」似乎存在。^⑦

(六)宗教、文化、總統制、和世界資本體系論對民主化的影響，目前學者沒有定論。^⑧

但是使用這六點結論時，必須注意到以下計量研究的一些限制。第一，在目前的計量研究中，學者使用不同的計量模型、變項、變數、和資料庫。由於沒有完全的科學知識累積性，使得我們無法確定新、舊研究的結果差異，是因為新的理論模型優於舊的理論模型，或是因為變項、變數、和資料庫等技術性的差異。

其次，過去的研究，多依賴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以前的資料。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以來，大量的國家轉為民主國家，過去的發現是否能適用於「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仍待驗證。何況，如 Huntington 所言，第三波的民主化有許多獨特的特性，例如共產政權的轉移、民主腐蝕、政治性的國際資助等，都意味著計量方法需要一些改變。

最後，雖然計量研究已經研究過許多的變數，但是這些變數有幾個限制，使得它們無法充分解釋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一)由於大部分的變數，都是總體結構性的變數，它們無法捕捉民主化過程的動態面。計量模型中，幾乎沒有政治行動者，沒有政治團體的互動，沒有政策的制訂和執行，也沒有妥協、威脅、合縱連橫等策略。似乎意味著，只要適當的大環境條件出現，民主政體就會自然蹦出來，或是自行成長。^⑨這與事實的觀察，顯然不符。(二)計量模型主要在找出所有國家在這些理論關係中的平均值，並不重視各國獨特的差異。因此，在做個案研究或比較時，計量模型可能有用、可能無關、甚至可能與實例相反。^⑩這個問題，更因為目前的統計計算，將所有國家的變數資料混合計算，而使得一國的發展資料，同時被其他國家的資料所「污染」。以及(三)雖然總統制或內閣制，在統計上對民主化沒有顯著的影響，但這並不表示

註⑤ John R. Oneal and J. Lew Silver, 1996, *op. cit.*, p. 9; John F. Helliwell, *op. cit.*, pp. 244~245; A. Alesina and D. Rodrik,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565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1991); Lev S. Gonick and R. M. Rosh, *op. cit.*, p. 190; A. Benavot, *op. cit.*, p. 400.

註⑥ E. Muller, *op. cit.*, p. 966; S. Lipset, Seong, Torres, 1993, *op. cit.*, p. 162; Arat, 1988, *op. cit.*, p. 32.

註⑦ John F. Helliwell, *op. cit.*, p. 230; Mark J. Gasiorowski and Timothy J. Power, *op. cit.*, p. i.

註⑧ Lipset 引用一些統計研究，認為宗教文化因素有影響，但是註⑨Stimson 的研究並不支持這種說法。Gonick and Rosh 認為世界資本體系對民主化似有某些關連，但是 Gasiorowski and Power 並不同意。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9, (February 1994), p. 5; Lev S. Gonick and Robert M. Rosh, 1988, *op. cit.*, p. 191; M. J. Gasiorowski and T. J. Power, *op. cit.*, p. 28.

註⑨ Tun-jen Cheng, *op. cit.*, pp. 194~195; A. Przeworski and F. Limongi, *op. cit.*, p. 176.

註⑩ Alistar Edwards, "Causes of Bewilderment: Necessity, Sufficiency and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for Democratization," *Democratization*, Vol. 1, No. 3 (Autumn 1994), p. 456.

「最近強調政治制度在民主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種誤導」。^②因為所謂的政治制度，並不僅僅指總統制或內閣制形式上的區別，而是泛指實際權力運作的規範和模式。這些實際的規範和模式，才是真正影響民主化過程中，菁英互動以及菁英與群眾互動的重要非量化因素。^③更何況總統制或內閣制本身就有一些差異。籠統的將國家區分為總統制和內閣制，並不能抓到「制度性研究」的重點。

計量研究的限制，使得研究者必須也顧及到「質的研究法」，以補不足。下一節即探討學者如何以「質的研究法」，研究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

叁、質的研究法

如前所述，社會科學中「計量研究法」絕對不只是數字遊戲而已；同樣的，「質的研究法」，也絕對不只是單純的歷史現象描述。由於歷史資料數目的龐大，幾乎沒有邊界，研究者在解釋像「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之間關係」的複雜現象時，必須也根據一些理論，選擇重要的解釋因素，來指導歷史資料的收集、整理、和解釋。這也是所謂的「歷史社會學」的方法論。^④因此，以下的討論，如計量分析法一樣，也分為理論的選擇以及變數和資料的運用兩節。由於「質的研究法」沒有模型建構的問題，因而省略。最後一節，探討結合質與量研究法的可能。

一、理論的選擇

關於經濟發展和民主化關係的研究，「質的研究法」和計量研究法所根據的理論，大致相同。事實上就時間先後而言，計量研究者大多根據「質的研究法」已經發現的研究成果，加以量化和測試。但是在量化的過程中，漏失了許多原理論的精義。因此，本節選出現代化理論、國家論、和策略互動論中，沒有被計量學者充分遵循的部分，加以進一步的解釋。

從「質的研究法」來說，現代化理論中解釋民主化的一個重要變項，是「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形成。固然大環境的因素很重要，如所得增加、工業化、教育提昇、都市化、媒體多元化等，但是這些因素最終要促成一個市民社會的興起，才能導致民主政體的建立和鞏固。何謂「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是指「介於國家與家庭中間的組織範疇。這些中介組織與國家有別，享有自主權，而且是由社會成員自願組合

註② M. J. Gasiorowski, 1995, *op. cit.*, p. 893.

註③ O'Donnell 認為在開發中國家，侍從主義可能比形式上的制度更為重要。Guillermo O'Donnell,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2 (April 1996), p. 40.

註④ 關於歷史社會學方法論的著作，見 Philip Abrams, *Historical Soci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David Hackett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而成，爲了保護或擴展其利益或價值觀」。^⑤誰構成這個「市民社會」？使用「質的研究法」的研究者，以往常常提到「中產階級」，認爲在社會分工和專業化之後，中產階級進而要求民主化，以保護財產，並擴大參與政治，因此是民主化的主要動員者和支持者。

然而，市民社會出現後，民主化就一定隨之而來嗎？White 認爲不一定。我們還必須進一步探討有那些社會團體構成這市民社會，這些社會團體的利益和政治影響力如何，是否有「政治企業家」的出現，國家的控制力的大小，以及社會的價值規範爲何。^⑥有時候，一個强有力的市民社會出現，因爲缺乏政治企業家、民主觀念、或者國家控制能力太强，而無法促成民主政體的建立，如新加坡和香港。反過來說，印度建國時，雖然沒有一個現代化的市民社會，但是仍然能夠建立民主政體，並維持至今。所以，如果只依賴現代化理論，我們無法充分解釋民主化的現象。國家論和策略互動論隨之而生。

國家論者從國家本身的制度結構、權力運作、和行政能力，來探討民主化和經濟發展的可能性。從 Huntington and Nelson 開始的國家論者，認爲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不容易並行，因爲這兩個體系同時的改革，對於大部分的開發中國家的國家機關而言，實在是超乎其能力之外。其推論就是，開發中國家必須在民主和經濟成長之間做一殘酷選擇。而且國家論者似乎比較傾向於主張「先發展、後民主」的順序，藉由經濟發展增強國家機關的能力之後，才能應付民主化所帶來的「參與的爆炸」。^⑦

至於那一類的國家機關，比較適合經濟發展？國家論中的一支，發展國家論，認爲這個國家機關必須有政治上的自主權、强有力的行政能力、以及對經濟發展有執著的政治領導者。關於發展國家論的介紹和批判，已有專著介紹，此不贅序。^⑧有趣的是，此一論點本來是以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爲例，說明「發展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隨著日本自民黨統治的中斷（1993年），以及台灣和南韓先後的民主化，發展國家論者仍舊以原先的分析架構，探討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民主政權鞏固的可能性。因此，民主政體是否能夠鞏固，經濟是否能繼續發展，要看國家機關執行財政和金融政策的能力。而國家機關的這些能力，是受到該國政黨體系（一個優勢政黨或多黨）、決策機構的結構（集中或分散）、和政治領袖對經濟改革堅持的影響。^⑨簡單的說，「沒有一個（新的民主政體）能夠完全避免民主與市場之間的政治衝突」。^⑩

策略互動論雖然也論及國家，但是比較重視領導菁英群中的策略團體，如何在制

註^⑤ Gordon White, "Civil Society, Democratization and Development(1): Clearing the Analytical Ground," *Democratization*, Vol. 1, No. 3 (Autumn 1994), p. 379.

註^⑥ *Ibid.*, p. 381.

註^⑦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an M. Nelson, *op. cit.*.

註^⑧ 請參閱 Cheng-Tian Kuo,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Industrial Growth i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5), chap. 1.

註^⑨ S. Haggard and R. R. Kaufman, *op. cit.*, pp. 178, 271.

註^⑩ *Ibid.*, p. 364.

度環境之下，與社會上的策略團體互動，以形成有利於民主政體建立和鞏固的策略聯盟。一國的歷史、文化、市民社會存在與否、和經濟結構等總體因素，並不扮演太重要的角色。^① 策略互動論者發現，民主政體的建立，通常有幾個步驟：(一)執政的領導菁英群中，面對國家的危機時，有派系的分裂；通常是既得利益、保持現狀的保守派，對抗後起實際路線的改革派。(二)社會上出現至少一個強力組織動員的反對勢力，持續對威權政府施壓。(三)領導菁英群中的改革派，有意無意的利用反對勢力，迫使保守派交出政權。(四)改革派、保守派、反對勢力達成「制度上的妥協」，藉著新的民主制度，保障基本的利益，並伺機擴展政治影響力。(五)只要新的民主政權中，主要的政治策略團體能夠在行為、態度、和憲政上，都認同民主政體的價值和程序，民主政體就會趨於穩固。^②

二、選擇變數和資料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歸納出現代化理論、國家論、和策略互動理論，所提出的三組重要變項：市民社會、國家自主性和能力、以及策略互動關係。雖然每一派的學者，對於這三組變項的定義，多少有些共識。但是對於找相關的變數（量化和非量化），則沒有太多的共識。

一個社會要有那些具體特徵，才算是一個市民社會？除了上節所列量化變數以外，一般研究者會蒐集以下的變數：社會團體的數目和種類增減記錄，其領導者產生方式（自選或國家派任），社會團體會員數、內部結構、和經費來源，他們與國家互動（主要衝突或合作事件）的前因和後果。

「中產階級」是現代化學者以前常用的概念，但是如何界定它，至今仍是個大問題。如果以收入、職業、教育程度、或意識形態等變數，來界定中產階級，結果要不是中產階級人數太少（狹義定義，符合所有這些變數的），就是中產階級所涵蓋的範圍太廣（廣義定義，符合其中之一變數的），使其失去成爲一個有用的分析概念。因此，近年來學者多不再使用「中產階級」一詞。^③

國家論者所常使用的變數，在國家自主權方面有：威權政體的特性，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憲政運作的模式，執政黨相對於在野黨的政治影響力，行政部門的專業或軍

註① G O'Donnell, P. C. Schmitter, and L. Whitehead, eds., *op. cit.*;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Terry Lynn Karl, "What Democracy Is and Is No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 No. 3 (Summer 1991), p. 83; Barry Munslow, and Francois Ekanga Ekoko, "Is Democracy Necessar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mocratization*, Vol. 2, No. 2 (Summer 1995), p. 158.

註② Adam Przeworski, "The Neoliberal Fallacy,"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Revisited*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8;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Toward Consolidated Democrac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2 (April 1996), p. 16; Diamond, 1993, *op. cit.*, p. 43.

註③ 少數例外如 Michael Hsiao and Hagen Koo, "The Middle Classe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n N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aipei, Taiwan, August 27~30, 1995.

人基礎，選舉制度等。國家能力方面的變數有：官員的教育背景、行政集權度、經濟計畫機關、國家機關控制財政金融政策的工具、國營事業等。領導者方面的變數，則為個人的意識形態、領導風格、權力資源等。

國家論者碰到的最大問題有兩類：一是如何界定國家能力的強弱，以及國家強弱是否對經濟發展有必然關係？前者的例子是日本，她沒有巨大的國營企業，也沒有太多的政府開支來干預經濟活動，但是大部分學者又認定日本國家機關是屬於「發展國家」。後者的例子如法國，她有中央集權的國家機關，國家機關藉著龐大預算和扶持特定大公司作為「全國冠軍」(national champions)來引導經濟發展，但是法國的經濟表現，一直不如主張放任政策、小政府的美國。同樣的，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如何區分國家機關的強弱，學者之間一直無法達成共識，更不要說如何確定「發展國家」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④

國家論的另外一個缺失，是蒐集資料的偏差。國家論者為了矯正現代化理論過分強調社會性變數的偏失，特別重視國家本身的變數。但是這種矯正，常常矯枉過正，反而忽略了社會性變數的重要。而且在收集資料時，也以官方口頭或書面資料為主，或者依賴經由新聞檢查過的媒體和書刊，較少或不重視民間的說法及資料，使得讀者無法分辨何者為事實，何者為官方宣傳。後來的國家論者，已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是也許因為理論的不相容性，也許因為研究重點的差異，並沒有太多成功的例子。^⑤

策略互動論的變數有：主要策略團體的成員、大小、經費，領導者的能力和意識形態，策略團體的團體利益，可供選擇的對抗和聯盟策略，對抗和聯盟的可能後果等。這種分析法的優點，是能夠掌握和瞭解民主化的每一步過程。但是也因此對於研究者的細心長期觀察、蒐集資料的人脈和能力，要求很大。同時，這種研究法令社會科學家迷惑的一點，是它的普遍性和科學性價值為何？除了前述的民主化步驟以外，似乎很難再從各國複雜萬變的策略互動資料中，歸納出可以普遍化的社會科學規律。所以這一派對於民主化過程研究的結論，可能是：看情況。然而，事實上，我們很難想像策略團體的互動，能夠不受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世界體系等大環境的影響。也就是說，結合計量研究法和質的研究法，不只是有方法上的必要性，也可能對於理論的整合，有很大的幫助。下節論之。

三、結合質與量的研究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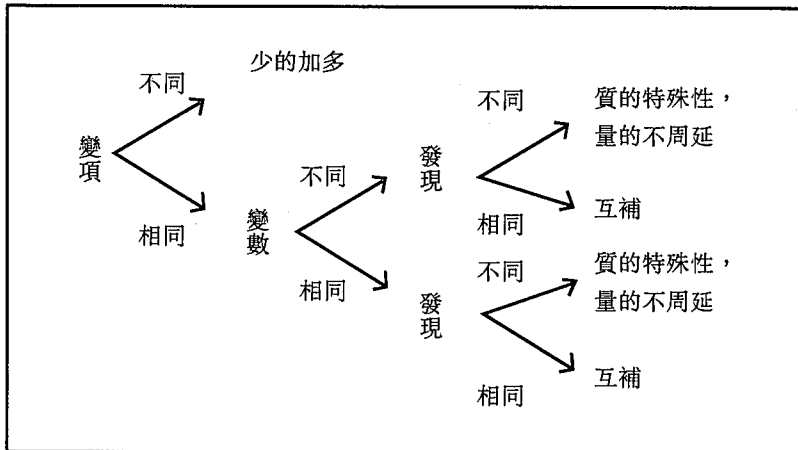
由上可知，結合質與量的研究法，來研究民主化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應該不只是一種學術上的妥協：計量研究法做跨國的比較，質的研究法做個案研究。而是有其方法論的必要性。這種必要性，可以由表二看出。計量研究法和質的研究法所使用的變項，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如果不同時，表示某一研究法在理論上，並未考慮到足

註④ 對於發展國家論的批評，見 M. M. Atkinson, D. Lam, and Cal Clark, eds., *op. cit.*.

註⑤ 例如 Haggard and Kaufman 的著作，雖然也有提到社會組織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但是作者並沒有解釋其中的道理。S. Haggard and R. R. Kaufman, 1995, *op. cit.*, p. 273.

夠的「控制項」，或者未測試其他理論的真確性。作為社會科學的理論，不論是計量模型或是質的研究法，都應該試圖比對現有各種理論中的主要變項。

表二 結合質與量的研究法



如果變項相同，則使用的變數相同與否，並不是太重要，因為很可能計量研究法只選用可量化的變數，而質的研究法只選用非量化變數。重要的是，這兩種研究法的研究結果是否相同？如果相同的話，這兩種研究法可為互補。如果不同的話，要不是質的研究法誤把兩變數發生時間的先後（或是同時存在），當成因果關係（例如文化對民主化的影響）；就是計量研究法漏了（或無法）測試一些變數，或者是它的計量變數沒有精確的界定，應該修正，例如總統制和內閣制對民主化的影響差異。

如何將這些原則運用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建議採取的方法是：⑥

- (一) 揀選幾個民主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作為比較。
- (二) 找出幾個經跨國測試有效（統計顯著）、並且有高解釋力（例如高 R^2 值）的計量模型，例如 Gasiorowski 新作。⑦
- (三) 保留該計量模型的截距和所有變數的相關係數。將某一國家解釋項變數的實際值代入，計算出應變項的數值。此一數值是根據計量模型所算出對該國的平均預期值。然後對照此一應變項的預期值和該國的實際值的差異。
- (四) 如果差距不大，可知此一計量模型所使用的變數大致正確，接下來找尋「非量化變數」輔助說明之。
- (五) 如果預期值和該國的實際值的差異巨大，則必須發掘其他重要變數，來解釋這個差

註⑥ 我們建議從計量模型開始，是因為「質的研究法」所涉及的反證過程比較困難，常常需要使用複雜的「反事實分析法」。請參考 Cheng-Tian Kuo, "International Regime and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Regulating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政治大學學報, 第七十二卷, 民國八十五年, 頁四〇三~四三八。

註⑦ M. J. Gasiorowski,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Regime Change," *op. cit.* .

異。這些「其他重要變數」可能是屬於該國特殊的歷史結構因素，因此並沒有社會科學理論的普遍性。但是如果這些「其他重要變數」在其他國家也出現時，則當初的計量模型就應該試圖將這些變數量化，正式加入模型中，並檢視原先變數的相關係數和顯著程度，是否有變動。

(六)預期值和該國的實際值的差異巨大，也可能是因為原計量模型中的變數，「運作化」不當，可以借用「質的研究法」所觀察的資料，重新界定該變數，而可能不需要另外找新的變數。

由此可知，結合質與量的研究法，不但超越了以往數十年社會科學中這兩派研究法的爭議。它更指出，只有在結合質與量的研究法時，才能夠避免使用單一研究法所容易犯的錯誤。

肆、台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法

國內學者在研究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關係時，幾乎都是採取質的研究法，而且在理論選擇上，也多以發展國家論為主。以下介紹研究的現況，並比對前述的討論後，舉出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現況

二次大戰後許多開發中國家同步進行經濟發展之工作，三十年後，台灣與南韓、香港、和新加坡並列亞洲四小龍，台灣之經濟表現受到世界肯定，因此引起學者研究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之興趣，及試圖解釋台灣「經濟奇蹟」發生的原因。本地學者因地利之便，在一九七〇～一九八〇年代，以中英文出版許多以台灣經濟發展為研究主題的著作。^②這些早期的著作，大部分是從自由經濟學派的觀點寫作，認為台灣戰後因為遵照自由經濟的原則，以高利率政策吸收足夠之儲蓄，累積足夠之資本，並採用貶低幣值，推行外貿自由化，靠外貿的帶動下使台灣經濟起飛。^③人力資源之優勢亦被普遍認為係促成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教育普及更使得人力素質提昇、使得台灣勞力密集工業得到人力支援，中小企業亦獲同步發展。^④此外，政府投資於基礎建設、改

註② Shirley W. Y. Kuo, Gustav Rains, and John C. H. Fei, *The Taiwan Success Story: Rapid Growth with Improved Distribution in Republic of China, 1952 ~ 1979*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1); G. Rains, J. C. H. Fei, and S. W. Y. Kuo, *Growth with Equity, the Taiwan Cas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蔣碩傑、吳榮義, *亞洲四條龍的經濟起飛* (台北: 中華經濟研究院, 民國七十三年); 郭婉容, 「光復後台灣的經濟發展」, *近代中國*, 第四十九期, 民國七十四年, 頁四八~五五。

註③ 蔣碩傑、吳榮義, 前揭書。

註④ 李國鼎、陳木在, *我國經濟發展策略總論* (台北: 聯經出版社, 民國七十六年), 頁四八一~四八六; 李國鼎,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and Strategies," *中山社會科學期刊*, 第三卷第一期, 民國八十三年, 頁二五~三四。

善投資環境亦彌補市場之不完整性。^①在總體經濟的表現上，物價穩定獲得維持，沒有高通貨膨脹現象，金融的穩定帶來高的投資意願。^②

有少數學者從馬克思主義之依賴發展論，來解釋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和限制。由於台灣受到來自美國和日本的經濟援助以及技術輸入，加上內部階級結構的轉變，使其在依賴中得到發展。可是在發展之下卻也顯現出美國和日本資金集團對台灣技術再升級之控制與限制。同時在政治上，威權政府也傾向對內加強控制，對外繼續聯合的形式。^③也有學者採用策略互動論的分析架構，探討政黨和派系在民主化過程中的發展、策略、以及合縱聯盟關係。^④

一九八〇年代晚期，隨著美國社會科學界興起「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風潮，國家論的研究成爲新趨勢。台灣因爲能有一個自主性和職能性都強的國家機關，透過符合市場競爭原則的政策，干預市場運作，成功的創造了比較利益而促使台灣經濟之成功。^⑤

除了前述研究之外，另有學者採取整合性的看法，同時探討台灣過去的政經體制發展歷程，分析歷史動態過程。認爲政經發展的動力必須同時考量政府和市場交互作用的關係。同時將政經發展作歷史分期，從而探討每一歷史分期中的所有相關影響因素，試圖捕捉台灣政經發展之全貌。^⑥這種研究方法傾向認爲台灣過去發展，政府與市場兩者皆相互影響，且隨每一時期的相關因素不同而呈現不同的互動。有些學者亦特別強調威權體制透過組合主義來提升和整合民間經濟勢力，達成國家發展目標。^⑦但同時形成龐大的寡占經濟體制，形成金權政治成長的溫床，並延伸至民主轉型期。^⑧

註① 郭婉容，前引文，頁五五。

註② 于宗先，*經濟發展啓示錄*（台北：三民書局，民國七十九年），頁一七～二二。

註③ 陳玉璽，*台灣的依附型發展*（台北：人間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頁三七～四六。

註④ 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英，民國八十一年）；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民國八十四年）；吳文程，*台灣的民主轉型：從威權型的黨國體系到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台北：時英，民國八十四年）。

註⑤ 廖俊松，「發展性國家機關的模型：日本、台灣、南韓的經濟發展經驗」，*空大行政學報*，第六期，民國八十五年，頁二七一～二八八；龐建國，*台灣經驗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幼獅，民國八十二年）；宋鎮照，「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 Enterpris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ast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NICs, 1950~1972」，*成功大學學報*，第二十七卷（人文、社會篇），民國八十一年，頁一〇三～一一六；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出版公司，民國八十四年）；周育仁，「我國政經關係變遷之研究」，*公共政策學報*，第十四期，民國八十一年五月，頁九九～一二七；以及「台灣經濟發展之政治基礎」，*法商學報*，第二十九期，民國八十三年，頁四五九～五〇七。

註⑥ 郭建中，「政治經濟學與台灣政經發展經驗」，*台灣大學中山學術論叢*，第十期，民國八十一年，頁九三～九五；蕭全政，「國民黨：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政經轉型」，*政治科學論叢*，第二期，民國八十年，頁七一～九二；齊光裕，*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民國卅八年以來的變遷*（台北：揚智，民國八十五年）。

註⑦ 徐振國，「組合主義與經濟發展」，民主基金會編，*中國的民主前途：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回顧與展望*（台北：民主基金會，民國八十年），頁二二。

註⑧ 朱雲漢，「寡占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蕭新煊編，*解剖台灣經濟——威權政體下的壟斷與剝削*（台北：前衛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頁一五六。

近年來由於台灣快速的民主化，使得台灣的政經發展，面臨重大的轉型。政治、社會、經濟諸面向的快速變遷，引起學者探討台灣民主轉型現象，以及分析民主轉型對未來的影響。由於民主轉型的影響是多面向的，因此這一時期的研究，即以民主轉型作為一背景因素，探討其中發生變遷的特定議題，而不像以往從巨視的觀點，看台灣整體的政經發展。其中公營企業民營化、政商關係的變遷、地方政經勢力的結合、以及民主化與公共政策制訂之間的關係，這幾方面的研究，有如雨後春筍的出現。◎

二、可能的研究方向

比較國內的政治經濟研究和前述方法論的討論，我們認為未來的研究方向有幾項：結合不同的理論，增加計量的研究，和歷史資料蒐集。首先就結合不同的理論而言，以發展國家論為主要的研究，在民主化的衝擊下，似乎必須加入社會性的變項或是策略互動的變項，才能解釋台灣國家機器在解嚴後的衰退，政策制訂和執行特性的多變，以及憲政體制的不確定性等「後威權體制症候群」。尤其是，如何將「市民社會」、「利益團體」、「中產階級（？）」、「商人」等基本概念，做更進一步的解析，以探討不同組織和階級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對政策的影響力。最後，如何把對台灣政經關係有重大影響的派系和財團，帶入現有理論的建構中，也將是後來學者的一大挑戰和突破。

其次，台灣經濟發展與民主化（或鞏固）之間的統計關係研究，是值得開發的領域。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大都附屬在成就斐然的選舉研究之中的社經資料分析，測試選民的社會經濟背景，是否對投票行為有影響。但是，投票行為只是民主政治的一環，其他諸如公民權的保障與公平、選舉是否公平、主要政黨競爭度、和主要政治決策者的民選基礎等變數，尚未納入計量研究之中。當然，做單一國家這種主題的計量研究，最大的困難是個案的數目可能太小，影響統計結果的可靠性。就算是每年做一個案，台灣戰後的歷史只有不到五十年。變通的方法，是將分析單位降到國家之下的行

註◎ 朱志宏、謝復生，*利益團體參與政治過程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國七十八年）；張清溪等，*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台北：自立晚報社，民國八十年）；宋鎮照，“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 Enterprises,” *op. cit.*；吳若于，*戰後台灣公營事業之政經分析*（台北：業強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徐振國，前引文；朱雲漢，前引文；周育仁，「台灣政經關係變遷之研究」，*政治學報*，第二十五卷，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頁八五～一一九；朱雲漢、黃德福，*建立台灣的政治經濟新秩序*（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民國七十八年）；丁仁方，「民主化與公共政策制定」，*成功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六期，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頁二〇五～二二四；「民主化對經濟組織的影響」，*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台灣民主化：回顧、檢討與展望」論文，民國八十五年；沈宗瑞，「國家統合主義與臺灣勞工的政治權力」，*國立臺灣大學中山學術論叢*，第十期，民國八十一年，頁一〇九～一二二；蕭全政，*台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民國七十八年）；劉阿榮，「戰後臺灣政商關係演變之研究（上）」，*近代中國*，第一一一期，民國八十五年，頁六二～八一；「戰後臺灣政商關係演變之研究（下）」，*近代中國*，第一一二期，民國八十五年，頁一五一～一七二；王振寰，*誰統治臺灣？*（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八十五年）。

政或選區單位，則個案的總數立刻可以增加到一千個以上。降低分析單位，可以解決個案數目的問題，但是也可能帶出其他理論和統計的問題，因為篇幅限制，不在此述。

最後，不論是計量或質的研究，台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前最缺乏的還是基本資料的蒐集。以發展國家論為例，除了早期的研究者，如 Gold 和龐建國等少數人以外，後來的學者並未增加太多關於國家機器內部運行的一手資料。反而是 Wade 和 Haggard 等人藉著翻譯所得的（官方）訪問資料，常被後來的學者所引用。對於公會團體的研究，目前只限於徐振國、丁仁方、和郭承天等人，有深入發掘公會的會議記錄，但所包括的公會種類和時間範圍，也有限制。目前對於台灣政治經濟學的資料蒐集，最好的資料庫，可能是陳明通的省議員背景資料庫。但是隨著立法院的重要性相對的高漲，立法委員的背景資料庫，應該儘速建立。還有，就是從日據時代到國民黨統治初期，這一段期間的資料，由於時間的久遠和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至今仍屬於初期開發地，目前只有少數回憶錄、私人捐獻（如李國鼎公文檔案）、和歷史學者的發掘（如二二八檔案），漸漸的揭開威權統治下真實政經互動的面紗。

伍、結 論

回顧過去關於民主化和經濟發展相互關係的研究，似乎繞了一個大圈子，但是在繞圈子的同時，也有一些新的理論和發現，推動了這個知識圈子往前進。繞圈子的原因，是因為現代化理論在沈寂一陣子後，又成為解釋民主化或民主鞏固的一個主要理論。而且因為學者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使得後來的研究者，無法有系統的判斷不同研究的真確性。這個知識圈子往前進的原因，是因為在比較不同的研究中，仍然可能導致類似的結論：有些是肯定過去的發現，有些是否定過去的發現，例如本文第貳章第四節的六項結論。未來的研究，仍然應該建立在過去的研究上，但是應該做計量研究法和質的研究法「之內」和「之間」的結合作，使得未來這方面的研究，更具有知識的累積性。

過去的學術研究，也提供了執政或在野的政治領導者，一些實際的功課。主要的功課是，追尋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並不一定是個「殘酷的選擇」。民主政治不一定會阻礙經濟發展，反而因為它對教育和民間投資的影響，對於經濟發展可能有間接的助益。自由派人士，也不能夠再期望經濟發展會自動導致民主政體的建立。沒有政治企業家的冒險投入，沒有強大在野勢力的施壓，民主政體的建立將會繼續延遲下去。不過，由於經濟發展對於民主化的程度和民主鞏固，似乎有正面的影響，因此自由派人士除了要求威權政府從事民主改革以外，似乎不應該忘了隨時監督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也就是說，一個完整的反對運動，應該至少包括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或者更好，有政治經濟學家的參與？

*

*

*

